

参与、 守持与 怀乡

孙犁论

叶 君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参与、

守持与

怀乡

孙犁论

叶君●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参与、守持与怀乡：孙犁论/叶君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2

ISBN 7-80230-358-3

I. 参... II. 叶... III. ①孙犁 (1913 ~ 2002) - 人物研究 ②孙犁 (1913 ~ 2002) - 文学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3054 号

本书得到黑龙江大学重点学科建设的资助

序 一

於可训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作家孙犁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种独特性从前在人们的印象中，是文学风格的另类。这种另类的风格，套用古人的话，称之为清新俊逸可也。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在他的影响下，已然形成了一个如同荷花淀的荷花那样“清水出芙蓉”的“荷花淀派”。有没有“荷花淀派”可存而不论，问题是，这清新俊逸四个字，与孙犁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的文学所崇尚的热烈高昂、雄浑豪放的主旋律，似乎就不能引为同调。茅盾当年曾用这四个字，形容过女作家茹志鹃的文学风格，使茹志鹃得以凭借一篇《百合花》一举成名。但已经有名的孙犁，却没有这样的幸运。虽然文学史家对他的这种另类风格，也给予了诸多肯定性的评价，但更多的是作为该时期文学多样化表现的个案来论析，并未被列入主流的文学风格的范畴。这个问题很早就引起了海内外研究者的注意，如今更是深挖细找、追根溯源，由文学风格问题转向了作家的主体构成，更具体地说，是由文学风格的另类，转向了主体构成的复杂。生前淡泊宁静的孙犁，不幸再一次成了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在一个本质化的时代，包括作家在内的人的主体构成，往往被简化为一个笼统的世界观问题。因而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就只能从世界观中找原因。而世界观问题，在那个崇尚阶级斗争的年代，又被“权力”认定为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这样，如果根据作家的创作判定作家的世界观不是属于无产阶级，那它确定无疑地只能属于资产阶级。但问题是，像孙犁这样的作家，论革命资历，是“三八式”的老革命，论文学经历，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从事革命文学创作，是新的“人民文艺”的有代表性的作家，怎么说也不好将他的世界观划到资产阶级那边去。这当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综观孙犁的创作，从写抗日战争到写新时代的新生活，除了风格的另类，在时人眼里，也确有许多疏离主流意识形态、偏离当时的方针政策的表现。这就难免要招致物议，甚至批评和批判。孙犁的世界观也因此够不上真正的无产阶级。既非“无”又非“资”，在这个问题上，无过不及、温柔敦厚的孙犁倒落得个“左”、“右”不是。幸好在这个二元对立的时代，也难免留有一些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就是所谓小资产阶级，或为减弱其程度、淡化其色彩，称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孙犁命中注定就得属于这个小资产阶级及其情调；他的创作中所有与主流和时代不合拍的东西，都注定要从这个小资产阶级及其情调中找原因。按：小资产阶级在那个时代的阶级划分中，本属于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因而在这个阶级的成员身上，就其主体构成而言，本来就包含有较多的复杂性。这倒合了本书所标举的“主体间性”的理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主题、题材、语言、风格不合而被贴上小资产阶级

或“小资情调”的标签的作家，正不知凡几。所以本书研究“作为间性主体的孙犁”和孙犁的“主体间性”，对当代作家研究而言，就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在众多企图深入孙犁的内心世界，解开他的主体构成之谜的研究者中，我感到，叶君博士的这部“孙犁论”，可谓另辟蹊径，别开生面。虽然，我并不一定十分赞同他采用“主体间性”这个外来的概念，但对他引入这个概念的良苦用心，多少还是能够体会的。所谓“主体间性”的“间性”，作者认为是指主体构成上的多源性与多元性，亦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家的出生、经历、教育、习染（所谓“多源”），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作家的个性、气质和思想、性格的多样性（所谓“多元”）。从这个角度来谈论作家，在西方叫做传记批评，中国古代的孟子称它为“知人论世”，现代的鲁迅则说是要顾及“全人”和顾及“全文”。凡此种种，所注重的都是作家主体构成的复杂性，以及造成这种复杂性的诸多内外原因。这就要求研究者深入体察对象所处的时代、社会和历史环境，以及诸多复杂的个体因素。否则，就难免以偏概全，如刘勰所言“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君的“孙犁论”是以“主体间性”的理论，激活了传统的传记批评和以“知人论世”为特征的社会历史批评，并以“主体间性”所提供的新的理论空间，完成了对孙犁的人生奥秘和文学世界的历史追寻。

因为要探寻孙犁的主体构成的复杂性，所以作者对孙犁的生平事迹的搜罗十分详尽，举凡孙犁的出生、经历、教育、习染中所有与文学活动有关的细节，一无遗漏，包括他的疾病和晚年心境，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外部环境的因素，包括故乡、家人、同志、朋友，沧海桑田、沉浮起

落的时势变迁、人生境遇、命运遭际等。这就保证了作者所见的孙犁，是一个活在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人群中的“全人”，而非一个单面的“革命作家”或“怀乡游子”、“知识分子”。因而也就保证了作者对孙犁的“主体间性”的探讨有了——一个世事人情皆洞明的逻辑前提。又因为作家的主体构成不能不通过作家的创作体现出来，所以作者对孙犁的创作活动的所有重要细节，同样也不放过。至于作为这种创作活动的结晶的孙犁在各个时期发表的作品，更是本书专题论析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对“存留于文本中的各种症候”，作者认为最能体现作家的“主体间性的裂隙”，所以搜抉扒剔倍加用心，也确实从中读出了一些常常为论者所忽略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得文本的细读，成了这部“孙犁论”的一个显明的著述特色。较之时下流行的一些不涉文本的凿空之论，我认为这种顾及“全文”的实证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叶君博士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致力于孙犁的生平和创作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为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毕业后，又以对孙犁的后续研究作选题，与我联系作博士后阶段的研究。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最终以一篇《孙犁论》完成了这个课题的研究工作，顺利出站。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改、打磨，现已成为一部成熟的学术专著，交付出版。因为在重读这部书稿的过程中，想到了上述当代作家研究的一些颇带普遍性的问题，顺手写了下来，既为叶君博士的这部专著作一点书前的装饰和点缀，也借此表达我对孙犁这位颇有古君子之风和士大夫气质的当代作家的一点虔诚的敬意。

2006年8月写于北京

序 二

〔日〕渡边晴夫

叶君的《参与、守持与怀乡——孙犁论》是孙犁研究的一个硕果。作者用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概念“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受孙先科教授观点的启发，写成这本著作。

著者把孙犁一生的文学活动分为三个时期，即从参加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直至封笔，把各个时期恰当地表现为“参与”、“守持”、“怀乡”。他用主体间性这个概念分析三个时期孙犁创作的特征，到达了稳定中肯的结论。

孙犁为什么能写出《荷花淀》那样富于诗意的、有独特风格的小说，他为什么能写出《铁木前传》那样的“多义而敞开的半部杰作”呢？叶君认为，“在孙犁的主体性构成上明显存在三个平行的层面，即革命战士、怀乡游子和知识分子。”“在不同人生时期孙犁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

主体性层面，而其他主体间性层面往往处于从属或被极力压抑而又不时得到顽强表现的状态。如怀笔从戎的青年时期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作为革命战士的孙犁；‘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孙犁则凸显出一个守持精神立场和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动人的游子情怀和在愤激之中所彰显的知识分子忧患意识，却共时态地始终伴随着孙犁那劫后余生的晚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作家孙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自己各种主体性层面的尊重和顾惜，以至于成就了他的多义性和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现象的特殊性。”

叶君着眼于孙犁作品的多义性，分析、阐述孙犁各个时期的思想和作品，很有说服力。当他进行研究的时候，凡是有关孙犁的论文，他大概都搜罗到了，例如，他在研究的过程中找到了像我这样的外国学者的论文。我这十年来一直研究孙犁，发表了十五篇论文，其中两篇翻译成汉语发表在中国的学术杂志上，他看到的是其中的一篇《文革前的孙犁——疾病的恢复与十年的创作空白》（《岱宗学刊》2001年第3期）。这篇论文是依据孙犁写的《芸斋小说》和散文，研究1956年他生大病的原因、恢复的情况以及考察他1962年为什么能突然发表17篇作品、重写《风云初记》尾声的缘故。叶君同意我的看法，2005年3月他写信给我，表明对我论文的较高评价。中国年轻有为的学者的这封信使我很高兴。2005年8月我作为交流研究员在南开大学研究的时候，他特意从武汉千里迢迢远路前来看

我。他的热情又使我感动了。

早在 1960 年茅盾这样指出过：“孙犁有他自己的一贯的风格。”“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茅盾真有眼光，他的指出很正确。我认为孙犁不仅是有独特风格的作家，而且也是当代作家中“历史局限性最小”的作家。他的思想和作品是限于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是拥有人类普遍的价值。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了，这情况我在《文学史上对孙犁评价的变迁——与赵树理对比》一文里论述过。我相信对孙犁的评价一定会越来越高的。叶君的著作是一部阐明孙犁这位作家的独特性的极有建树的佳作。

2006 年 10 月于日本东京国学院大学

序 三

刘宗武

孙犁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他虽然不及“五四”时期的一些老作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创作翻译无所不精，但在新文学史上，像他这样既有杰出的文学创作，又有系统的理论著作，也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孙犁生前，我们每每与他叙谈，涉及对他的研究时，他都谆谆教诲我们首先要读他的作品，他的一切都写在里面了。在看过一些研究他的论文后，他就一再强调要有“新意”，即要拿出自己的看法，不能炒冷饭，也不能重复别人，更不能“年年把破帽拈出”，总是老面孔，没有一点新鲜的东西。

其实，这都是文学研究的 ABC，是起码应该做到的。精读作品，即要有很强的文本意识，这是一项基本功，研究者的一切看法都来源于读过作品之后；脱离了作品，那只能是无中生有，言不及义，不会有正确的分析评论，更遑论精辟透彻、真知灼见。而要有新意，虽说是研究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要真正拿出不同凡响、不落窠臼的独

到见解，没有较深厚的理论，没有渊博的文学知识，没有过人的才华，又谈何容易！所以，新时期之初的一段时间内，面对文艺评论界浮夸之风盛行，孙犁很不以为然。他说：“近年文论，只有两途，一为吹捧，肉麻不以为耻；一为制造文词，制造主义，牵强附会，不知究竟。”又说：“今日文坛，有些现象，甚难言矣。……今天一个突破，明天又一个突破，突破来，突破去，还是那些老调重弹。今天一个里程碑，明天一个划时代，后天一个文起八代之衰呀，大后天又一个英雄时代的典型呀，到头来，叫喊者自己，也忘了他究竟喊叫的是什么货色了。”像他这样对文坛上的不良现象直言不讳地给予尖锐批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然，不能说没有新意的文章就不能写了，但绝不能放松对它的努力和追求。一篇论文或一部专著的发表、出版，总应带来一些发前人之未发，见前人之未见的东西才好，不然，是无法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的。

孙犁的创作，在20世纪40年代以《荷花淀》蜚声文坛，名驰遐迩。“文化大革命”前即已出版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和一些散文、诗歌等。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独具风格，并一度形成流派——荷花淀派。他的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广泛好评，但对他的深入研究，应该说只有在新时期以后，才得到文学研究者更大的注意和重视。1980年9月18日，在石家庄举办了关于荷花淀派的座谈会。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最早为作家专门召开的研讨会之一。许多学者、专家聚集一堂，热烈发言，认真探讨，对孙犁的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后，20世纪80、90年代，有关孙犁研究的论文遍及全国各地的报刊，并陆续出版了一些对

其小说、散文和文学道路进行研究的专著，还有几种关于他的传记、评传等著作也先后问世。同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等断代的文学史专著中，也都列出了专节、专章对其文学活动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评述。总之，他在新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不过，总的来说这些早期或较早的论著，一般的都是比较传统的，观念和方法相对也比较保守，同时限于资料的匮乏或其他种种原因，还缺乏更加鲜明的新意，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也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似乎也还没有达到孙犁所期望的“新意”。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孙犁研究中有一批研究者脱颖而出，他们独辟蹊径，不但敢于标新立异，既没有失去传统的东西，又掌握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而且敢于突破、敢于自出机杼，出现了一批颇富新意的研究成果，如《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杨联芬）、《再释孙犁》（张景超）、《作家的“主体间性”与小说创作中的“间性形象”——以赵树理、孙犁的小说创作为例》（孙先科）、《守护与反抗——作为知识分子的孙犁》（阎立飞）、《孙犁小说创作的深层心理探析》（李遇春）等。随着这批研究成果的出现，孙犁研究随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和全新的境地。这对于长期停滞不前的孙犁研究来说，毫无疑问是别开生面的。当然，不能说这些研究成果就是十全十美的，也不能肯定其中的观点都是孙犁所期待的富有“新意”；但“诗无达诂”在这里同样适用，即便有了引商刻羽之音，也应有下里巴人的一席之地。何况，他们的论著多是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这是不容置疑的。

阎庆生教授早年专攻鲁迅研究，近年来钟情孙犁研究，

2004年其专著《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出版，时隔两年又有叶君博士的《参与、守持与怀乡——孙犁论》（下简称《孙犁论》）问世。这是孙犁研究的又一崭新成果，一部全面、切实而又有自己独到见解的孙犁论，书稿读后真是令人不胜欣慰之至。

叶君博士与阎庆生教授，一位远在黑龙江（他写作此书时在湖北），一位远在陕西，他们都远离天津，从未与孙犁晤面，也从未与孙犁有过联系。但是，叶君酷爱孙犁作品，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其间一直坚持不懈、全身心投入到孙犁研究之中。几年来，他矢志不移，潜心攻读孙犁作品，并广泛收集资料，认真爬梳剔抉，对一些前人未曾涉及或涉及不深的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条分缕析和开掘探索。尤其可贵的是，他有深厚、坚实的理论修养，细读孙犁的全部作品，熟练运用新的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研究。不能说他的全部评析都准确无误，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所写出的都经过了独立思考，有新意、有创见，是孙犁研究新的开拓与突进。

作者以孙犁的一生，从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到2002年去世，按历史发展变化分为四大阶段加以论述，无疑是比较妥当的。书稿的逻辑构成十分完整，每一章的标题都抓住了关键问题，既醒目又相当准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综观全书，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更是值得一提。

其一，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对于当时的每一个青年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面临着不能回避的选择：做抗日战士还是当亡国奴，还是当汉奸，抑或逃亡隐匿，远离苦难中的祖国……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抉择，而孙犁则怀笔从戎，以笔作为武器对敌斗争，乃至写作成为其毕

生的事业。回忆当年，他不无自豪地说：“伟大的抗日战争，把祖国各地各个角落的有志有为的青年，召唤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奔向前方，他们是国家的一代精华，蕴藏多年的火种，他们为抗日献出了青春的才力……”叶君则认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对于孙犁来说，提供了一个为其融入时代的绝好契机。孙犁之于时代，与其说是被动裹挟，倒不如说是主体对于机缘的适时把握……新生活的展开，扫除了孙犁不知如何选择人生道路以及自感无所用世的苦闷，带来一种基于外族侵略压力的精神亢奋。同时，他也找到了为民族出力和重塑自己的方式，那便是在对时代进行激情体验的基础上，写出有益于时代的文字”。这是非常精彩、非常恰切的。对孙犁的人生选择，必须有这样的认识，不然，是不会对他的人生道路和文学事业做出正确的论述的。另外，值得提出的是，作者特别注意到孙犁在抗战初期写的理论文章，认为“在这些理论文字里，分明凸显出此期孙犁那使用文艺武器参与民族抗战救亡的文艺战士形象”；而且，一直到1949年以后，“孙犁仍然是以文艺战士的姿态面对全新的生活，表达其急于参与到新生活中去，为新生活而歌唱的峻切愿望”。

其二，孙犁的小说曾被人称为诗化小说。有人认为，“艺术的本质都是诗的，都是以诗意的形式出现的。但在孙犁的小说里，这个特征是这样明显，我们很难发现他的哪一篇作品没有诗的段落、诗的句子”。而本书则进一步为“探讨其诗意缘何生成”做了很大努力，这的确是以前相关著作中比较少见的。作者的很多论断极其精辟，令人折服。例如，在分析了《荷花淀》、《嘱咐》中夫妻之间的相互嘱

附之后，说“其中动人之处，我认为并不在于字里行间洋溢的革命乐观主义激情，恰恰在于那种属于个人的情感与想望的传达，它是基于战时游子与家之间的情感驱动，诗意便生成于战争与家之常态的错位”。又说：“诗意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源自这些极为精粹的乡村图景发现和一如乡村般朴素的抒情传达”；“诗意的生成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归功于孙犁作为间性主体的独特观照视角”。或许有人不会认同这些看法，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供大家研讨。

其三，孙犁的创作，前后两次受到较大规模的批判，也有几篇小说颇有争议。孙犁自己曾说：“在过去若干年里，强调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也可能就有人批评了；有时强调第二标准，情况就好一些”。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叶君对此有他非同一般的见地和认识。他认为孙犁的“言说个性与时代性言说诉求之间所存在的错位甚至冲突仍然十分明显。因而，其创作招致那些操持政治意识形态批评话语的批评家们的不满在所难免”。一般地说，孙犁的作品没有出太大的格，他从来没有别人不敢说的，他冲口而出；别人不敢表现的，他抢先写成作品；也没有像有的作家那样，触及进城后某些老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不然，即使“反右”时在外养病，他恐怕也难幸免。本书对受过批评或有争议的小说（散文），如《一别十年同口镇》、《琴与箫》、《村歌》、《钟》、《秋千》、《婚姻》乃至《铁木前传》等，都做出了与以往有些文章不同的剖析，最后得出结论：“由以上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存在于孙犁内心深处的关于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紧张与焦虑。这促使他在创作中不自觉地表现出生活中的不和谐来，而作者在个人与群体之间所表现出的暧昧立场，也传达出孙犁内心所交织的矛

盾和惶惑”。我认为，这些话是不无道理的。

其四，孙犁自述“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因而创作上有20年的“空白”。应该说，这是概而言之，比较模糊的说法。因为有病是实实在在的，创作却不完全是空白。日本学者渡边晴夫教授对孙犁的这20年做了非常认真细致的梳理，罗列出其所有的写作和其他文学活动，并探讨其“病因”。而叶君则更准确地说，“自生病到‘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孙犁把自己创作上的‘空白’笼统归结为疾病的影响。但这是一个大有深意的说法，有材料证实其实并不尽然……通过对‘孙犁在1962’的考察可以看出，疾病并不是影响其写作的主要原因。‘写’与‘不写’，在我看来更多表现为一种人生态度和立场的选择”。其后，在“孙犁的‘病’”、“孙犁在1962”两小节里，作者对孙犁的病精研细究，反复琢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反观孙犁的‘病’与其创作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导致孙犁不能写作的不仅仅是生理疾患，他更‘病’在心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创作‘空白’，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不能’而是‘不为’。这‘不为’显然是其坚守自身立场和清正人格，追求人格自保的策略性选择，而这种选择决定了孙犁在当时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中成了一个独特的个案”。

总之，在我看来，以上几点都是孙犁一生中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上最最关键的问题，也是所有研究孙犁的学者已有的共识。而本书对此无不作出了精细、透彻而独到的分析和论述，完全有益于对孙犁作历史的、整体确定性的研究。然而，本书的观点是否都准确无误、无可挑剔呢？当然不是。在某些问题上（尤其是文学创作），见仁见智是允许的，从来不可强求一致，如果求全责备，谁都难以下